

学林

← (上接 11 版)

犹太人生活在异族统治中根本没有希望,唯有时刻不忘神的“应许之地”,才能确保犹太人幸存,故犹太史的主旋律应当是揭示历代犹太人对以色列地的渴望和回归。活跃在 19 世纪、20 世纪前半期和 20 世纪中后期的三位犹太历史学巨擘就分别与这三种立场密切相连:格雷茨(Heinrich Graetz, 1817—1891)、杜布诺夫(Simon Dubnow, 1860—1941)和索罗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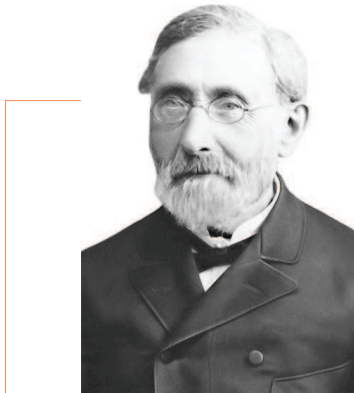
他们无疑都在伊格尔斯的视域中,但他在自传里只提到了杜布诺夫。杜布诺夫是东欧犹太人,其十卷本《世界犹太人史》是伊格尔斯青少年时期如饥似渴的读物之一,杜布诺夫关于犹太传统具有双重特征的见解给他留下极深刻印象:犹太教既能用仪式和人种来定义,又可看作普世的伦理体系。虽然意识到后一种特征并非犹太传统的主流,但伊格尔斯还是更认同它。需要看到,强调犹太教的普世性,是与“自我教化”所追求的融入主流社会的世界公民观相一致的。

尽管推崇杜布诺夫,但伊格尔斯在两个方面与他大相径庭。在方法上,杜布诺夫致力于研究历史上自治的犹太社团,关注的是制度史,而伊格尔斯是众所周知的思想史名家,其智识兴趣仍根植于德国语境而非东欧语境。两人更深刻的对立则体现在对犹太教与现代社会的认识上。杜布诺夫笃信犹太人的未来在于通过自治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相形之下,伊格尔斯并不以人种看待犹太教,而觉得它更像是在后启蒙时代的德国那样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存在于现代文化之中而不是之外。换言之,他并没有把犹太教完全当作一个可以独立于现代世界之外的私人领域看待。

伊格尔斯对格雷茨和索罗姆这两个德国犹太人的彻底沉默,也彰显了他自己的思想取向。格雷茨代表了历史主义在 19 世纪德国犹太人中的最高结晶。到他写作时,犹太史是犹太教史的观念已在德语犹太历史编纂中根深蒂固,但他更愿意用“民族魂”(Volksseele)这个比宗教宽泛的观念来统摄犹太史,他既没有脱离犹太民族抽象地去谈论一神观念,也没有去关注犹太过去那些纯粹物质的方面。他的十一卷《犹太史》(1853—1876)写的是犹太集体灵魂的历史。不过,在格雷茨的时代,同化之风在德国犹太社团中越刮越烈,反犹主义

也已在德国社会兴起。他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此,他写的历史旨在为被现代性重创和削弱的犹太认同聚气和寻根。显然,这与“自我教化”的经典内涵、与伊格尔斯热情拥抱的世界公民理想南辕北辙。

格雷茨反对同化,但还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索罗姆是。索罗姆 26 岁离开德国,移居耶路撒冷,他一手把犹太神秘主义引入严谨的学术研究殿堂,最终成为 20 世纪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犹太学学者。这一学术成就建立在对近代德国犹太学术的反叛之上,因为 19 世纪的德国犹太学者为了迎合德国主流社会,将犹太神秘主义视为民族糟粕,避之唯恐不及。在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方面,伊格尔斯其实与索罗姆很像,他年少时也热切地想移民巴勒斯坦,去那里的基布兹劳作,并因此与父母关系紧张。然而,在伊格尔斯自绘的思想谱系中找不到索罗姆的名字,其著述似乎也从未透露出任何对犹太神秘主义的智识兴趣。他倒是提到了与索罗姆过从甚密的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布伯晚年不顾众多以色列人的反对接受了联邦德国颁发的歌德奖,他在德语世界被广泛视为文化沟通的架桥者。较之布伯,索罗姆对德国没有温情与敬意。他认为一些学者所谓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话或共生根本不存在,历史上只有德国犹太中产阶级一厢情愿的幻觉,如今已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索罗姆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左右着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编纂对德国犹太教的想法:德国犹太人的同化倾向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参与了为自己的掘墓。这无疑是伊格尔斯难以接受的,他千方百计要消除美国的大学生对德国的强烈仇恨,致力于加强与德国学术界的对话,后来还加入了德国籍。



格雷茨(Heinrich Graetz, 1817—1891)



杜布诺夫(Simon Dubnow, 1860—1941)



索罗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

近代犹太历史编纂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犹太人近两千年来散居在世界各地,既然没有国家和土地,犹太史的连续性靠什么来体现?对于这个问题,到伊格尔斯思想成熟的时代,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答案,对应三位犹太历史学巨擘:格雷茨、杜布诺夫和索罗姆。他们都在伊格尔斯的视域中,尽管他在自传里只提到了杜布诺夫。

犹太身份 VS. 世界主义

如此看来,伊格尔斯的思想中有一对根本性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他作为犹太人有特殊性的民族和宗教认同;另一方面,启蒙和“自我教化”的遗产将对普世性的追求化作他的信念。这种紧张所带来的问题——犹太性还是共通人性?犹太认同还是批判性的学术?——其实也是近现代犹太人历史学家一旦试图跳出神学框架

面对犹太史时所共有的。

格雷茨把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内化,写出了犹太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对于非犹太文化,他很少掩饰自己的负面评价;但对于犹太文化中与德国文化不合拍的因素,他又毫不留情地冷嘲热讽。杜布诺夫虽然承认犹太人可以在异族统治中,但对犹太民族的情感依恋使他不可能将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归咎于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外部因素对犹太精神生活的影响在他那里也被最小化了。德国的反犹主义将索罗姆转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者,让他反叛了德国犹太学术,可他之所以能开辟出犹太神秘主义学术研究的新天地,靠的却是来自德国学术严谨的语文学和历史考证方法。

需要看到,历史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引发了近现代犹太教中一个深刻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犹太学者开始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犹太传统,一种反思性的历史观从此进入犹太人自我意识的中心,构成犹太认同不可或缺的要害。但由此也使得上述内在紧张的种种表现普遍存在。伊格尔斯批判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质疑了德国历史职业所自诩的客观性,可他如果去书写近现代犹太历史意识的流变,他的犹太民族和宗教认同定然会让他意识到,在近

现代犹太历史学家那里体现出的难以化解的重重矛盾,也羁绊了他自己,必令他感到无从遁逸。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又增加了新的困难。后现代思潮合理质疑了一种稳定本质的存在,这使得今天不存在单数意义上的犹太认同,而只有形形色色复数意义上的无甚关联的犹太认同,因而也就无法再像格雷茨、杜布诺夫或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去构建犹太史的种种宏大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s)。强调犹太史的连贯性虽然已失去昔日的合理依据,但现代化、同化和反犹主义给近现代犹太人普遍带来的压力却又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伊格尔斯对近现代犹太历史编纂的沉默,不能不说是这重重困难的表征。

尽管如此,犹太身份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还是在伊格尔斯选定的学术和社会领域起了作用。伊格尔斯对学术上欧洲中心论的反对、对来自弱势群体——东亚、印度、非洲、女性——学生的提携和帮助、对反抗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秉承了启蒙运动对普遍人权的伦理预设,但另一方面,正如他曾坦言的,也与他童年时在纳粹德国受到的歧视有关。正是反犹主义才让他日后对一切形式